

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学术研究衰微的数据分析^{*}

□ 王一心

摘要 通过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图书馆学术活动的考察,包括专著出版与论文发表相关数据、图书馆协会组织活动状况的统计分析,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学术研究与进程曾产生深重的负面影响,由此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图书馆学专著 图书馆学期刊与论文 图书馆协会 学术活动与进程
分类号 G259.295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6.017

近代以来,伴随着区别于传统藏书楼的先进图书馆的急速扩张,以及“新图书馆运动”的轰轰烈烈,“由科学组织、人才培养、学术成果发表组成的图书馆研究体制”^[1]在图书馆学人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体制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开展。但“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图书馆事业由此陷入低迷。相应地,朝气蓬勃的图书馆学术研究也随之趋于衰微。

1 图书馆学专著数量、质量双降

1.1 图书馆学专著数量的“断崖式”下降

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专著的源头在哪里?这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问题。1909年初,山东巡抚袁树勋呈上奏折,以“开民智而保国粹”为由请求在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得准。图书馆即于仲春开建,秋天完工,命名为“山东图书馆”。该馆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图书馆,但其于建成后、年底前颁行的《山东省图书馆章程》,有学者视为我国问世的第一部图书馆学著作^[2]。

同样在1909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图书室筹建助手的孙毓修,以《图书馆》为题名,在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上连载,1909年连载3期(第11—13期),1910年连载5期(第1、8—11期),自此未见后续,也未见结集出版。《图书馆》的定义于是产

生歧见:有学者以它现成的部分将它归为论文;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专著而以专著视之^[3]。

此后十几年,仿佛是起步蹒跚,也仿佛是待机蓄势,图书馆学著作每年只有少则1部多不过7部出版,直到1924年为止。1925年在中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史上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不仅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较之上一年出现243%的惊人发展,更结束了每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一直在个位数徘徊的局面,实现了由个位数向十位数的突破,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十位数的水平保持了19年,直到抗战后期的1943年。

1928—1936年,每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中间只有1932年与1935年分别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但未改变出版数量总体向上的趋势。此两个年度的下降,从数据上看有相近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见表1)。

表1 1924—1947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统计^①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1924	7	1932	40	1940	12
1925	17	1933	64	1941	21
1926	13	1934	87	1942	11
1927	11	1935	65	1943	10
1928	27	1936	95	1944	7

^{*}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十四年抗日战争’日本文化侵略的图书馆视角”(批准号:17YJA870019)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王一心,ORCID:0000-0002-5716-7886,邮箱:w8969@126.com。

^①资料来源:范凡.1909—1949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年代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1929	32	1937	39	1945	4
1930	44	1938	21	1946	7
1931	51	1939	14	1947	17

相近之处是两个年度出版数量的下降,同样出现在年出版数量持续增长之后,此时一定数据的回落,未必不属合乎出版规律的正常范围。尤其是这两年的数据回落,都是短暂而非持续性的——在它们的翌年,又都出现了“报复式”的增长,1933年的出版数量是1932年的160%;1936年的出版数量是1935年的146%,即是明证。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1935年的出版数量虽然只占1934年的74%,但仍然超过1933年的近1.6%,加上综合该年度国内未有重大事件发生,由此推测1935年的下降系出自出版本身因素的可能性极大。而1932年的出版数量占上一年度的78%,下降幅度低于1935年下降幅度的4%,但它却还低于1930年的出版数量,恰1931年发生有“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等特大事件,尤其是日军在“一二八”期间出动飞机,炸毁了我国出版界首屈一指的商务印书馆,不可能不对出版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图书馆研究著作出版数量发生“断崖式”下降,出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当年的出版数量只占1936年的41%,下降是急遽且持续性的,呈现出一种恶性态势。1938年的出版数量又只占1937年的54%,1939年的出版数量又只占1938年的67%,1940年的出版数量较之1939年又下降了14%。在1941年的出版数量回到1938年的水平之后两年,重又回落到1941年的50%左右,而1944年、1945年的出版数量更倒退到20年前的水平,以至1946年都难以有起色。由此可见,图书馆学著作受抗日战争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

表2 全面抗战前与全面抗战中图书馆学著/译作数量对照^①

历史阶段	理论专著	技术及工具书	图书史及图书馆史	译著与编译	非本馆调查及报告
全面抗战前10年(1927—1937年)	105	87	23	33	21
全面抗战8年(1937—1945年)	22	22	9	5	0

表2所列数据清楚地表明,全面抗战8年中图书馆学著/译作出版的数量相比于抗战之前的10年,各项均有大幅度下降,后者与前者之比依次为:理论专著占21%;技术及工具书类占25.3%;图书史及图书馆史占39.1%;译著与编译著作占15.2%。前4项中,出版下降相对数由大至小依次为第一、第二、第四、第三项;下降幅度由大而小依次为第四、第一、第二、第三项;而第五项在全面抗战的8年中的数据为零。

更为关键的是,表2在呈现各类著作出版数量下降的表面数据下,还揭示出一个潜在的事实,即出版物质量的下降。

1.2 图书馆学专著质量的低落趋势

通过对图书馆学专著作者的分析发现,他们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建树均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此后,他们的图书馆学专著在理论性、学术性、技术性等方面大多乏善可陈。以杜定友(1898—1967年)为例,其作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分类学及汉字排检法^[4]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有明确出版年代可查的出版于全面抗战爆发前10年间的著作近20种,出版于全面抗战8年间的著作仅有4—5种。而前者中包含有诸多重要著作,代表作有初版于1922年、1935年三版时定名的《杜氏图书分类法》,以及《图书馆学概论》(1927年)、《学校图书馆学》(1928年)、《校雠新义》(1930年)、《汉字形位排检法》(1932年)、《图书管理学》(1932年)、《明见式编目法》(1936年)等,后者只有《国难杂作》(1938年)、《图书出纳》(1941年)、《图书馆管理程序》(1941年)、《图书管理程序》(1941年)、《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法简本》(1943年)等,显然学术影响力较前者为轻。

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吕绍虞(1907—1979年),其著述于1933年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开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短短4年间即出版重要著作有《图书之选择与订购》(1934年)、《简明图书馆管理法》(1935年)、《图书分类的原理与方法》(1935年)、中文标题总录初稿(1935年)、《世界图书馆史话》(1936年)、书报杂志阅读的方法

^① 资料来源: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书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附录.

(1937年3月),另有译著与编译著作各2部。而于全面抗战8年间,只有《图书馆通论》《图书馆学论丛》《怎样利用图书馆》《最近之上海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浙江省图书馆事业概论》《中国图书馆大事记》等问世,虽然其中不乏力作,然萎缩之迹象仍清晰可见。他的7部著作,5部出版于1938年,2部出版于1941年,亦即全都出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战前半期。

另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均于全面抗战前10年内甚至更早,即有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面世,而于抗战8年中却甚少理论建树。比如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著有《图书馆学》(1927年)、《中国图书馆计划书》(1927年)、《英国国立图书馆藏书源流考》(1932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1936年)的李小缘(1897—1959年);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著有《中文图书编目规划》(1932年)、《分类大全》(1935年)、《大学图书馆使用法》(1936年)的桂质柏(1900—1979年);著有《现代图书馆经营论》(1928年)、《现代图书馆序说》(1928年)、《现代图书馆事务论》(1934年)的马宗荣(1896—1944年);著有《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中

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1929年)、《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的刘国钧(1899—1980年)等。

2 图书馆学期刊及论文的萎缩

2.1 图书馆学期刊的灭顶之灾

我国的图书馆学期刊始于1915年12月创刊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在此之后22年的岁月里,虽也曾有高潮和低谷,有在社会动荡变迁等外力因素干扰下造成的波折,但总体上未脱离按自然规律正常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到1936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图书馆学期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可就在此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准备,经过6年的局部军事侵略的尝试,蛇吞象之心膨胀,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图书馆学期刊造成的后果非“严重”可以概括,而只能以“灭顶之灾”形容。一年之间,“全国重要的图书馆学期刊由1936年的三十三种急剧下降到五、六种”^[5],因战争而被迫停办的期刊达数十种。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由草木繁盛的盛夏时节一下落入冰天雪地的寒冬之季。

表3 1937年停办的图书馆学期刊^①

序号	刊名	主办(编)者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1	《工读半月刊》	上海工读半月刊社	1936.5	1937.1
2	《佛教图书馆报告》	北平佛教图书馆	1936.7	1937.1
3	《东南日报·图书周刊》	杭州东南日报社	1937.1	1937.2
4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北京图书馆月刊》《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28.5	1937.2
5	《厦门图书馆声》	思明县立厦门图书馆	1932.1	1937.3
6	《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	广州大学图书馆	1933.6	1937.3
7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	1934.5	1937.4
8	《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	浙江省图书馆协会	1936.5	1937.4
9	《广州学报》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1937.1	1937.4
10	《学觚》	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1936.2	1937.5
11	《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	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	1937.2	1937.5
12	《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	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	1937.4	1937.5
13	《图书馆学季刊》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6.3	1937.6
14	《学风》	安徽省立图书馆	1930.10	1937.6

① 资料来源:主要根据张敏2015年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研究》附录1的《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期刊名录》进行统计。以停刊日期先后为序,相同停刊月份者以创刊日期为序。

序号	刊名	主办(编)者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15	《文澜学报》	浙江省立图书馆	1935.1	1937.6
16	《大夏图书馆馆报》	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	1935.4	1937.6
17	《出版周刊》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1	1937.7
18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25.6	1937.7
19	《期刊索引》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2.11	1937.7
20	《大公报·图书副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9	1937.7
21	《图书季刊》	上海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4.3	1937.7
22	《日报索引》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4.5	1937.7
23	《量才月刊》(《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	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	1936.8	1937.7
24	《图书展望》	浙江省立图书馆	1935.10	1937.8
25	《书林》(《民国日报·图书周刊》)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1937.3	1937.8
26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1928.11	1937.10
27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文华图书科季刊》)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社	1929.1	1937.12
28	《图书增刊》	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	1932.12	1937.?

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辑发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以及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社编辑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曾用名《文华图书科季刊》)并称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三大学刊，“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及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6]，其中《图书馆学季刊》更被称作“我国历史上第一种图书馆学权威期刊”^[7]。另外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厦门图书馆声》《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学觚》《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学风》《大夏图书馆馆报》《图书展望》《书林》均位于“著名”期刊之列^[8]。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柳诒徵的苦心经营下，成为既有相当学术分量，又极富文献学特色的专业期刊。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的《大公报·图书副刊》，因系天津《大公报》发行，量大面广，其与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出版周刊》，同样是在读者中相当有影响的刊物^[9]。总之表3中期刊多为图书馆界重要刊物，而于1937年纷纷停刊(《出版周刊》更已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迫停刊过一次)，可见当年战争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在“七七事变”前后的六、七、八月份，更有多达13种期刊(表3中期刊的46%)集中停刊，更显现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戕害。

地处南京市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其编辑发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前身为《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于1937年10月停刊，也是受战争直接影响的结果——1937年8月中旬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以80万军队与20万日军在上海展开近3个月的殊死之战，虽然使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成为谗吃，却也终未能阻遏日军继续前行的铁蹄，以至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0月30日从南京迁都重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7年底于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出版时，还刊登了一个“特别启事”，称“因时局关系，印刷局及纸张皆发生困难”，致两期合刊且篇幅减少，请订户与读者原谅，表示“此后如果可能，仍当努力继续出版”，而实则此期成为终刊。

2.2 图书馆学论文的急剧凋敝

图书馆学相关论文见诸报刊的，在抗战全面爆发前10年间(1928—1937年)共有4070篇，而抗战8年间(1938—1945年)只有510篇，后者仅占前者的12.5%。从单年来看，1936年计616篇，1937年即腰斩为301篇，1938年又降至56篇，1945年更只有29篇^[10]仅为1936年的4.7%。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研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表4 全面抗战前与全面抗战中图书馆学论文数量分类对照^①

序号	类别	1928.1.1— 1937.7.6	1937.7.7— 1945.8.15
1	图书馆学总论及图书馆事业	153	39
2	各种图书馆专论	284	29
3	图书馆法规:理论、法令、规程	121	28
4	图书馆行政:总论、组织、经费、 人员	87	2
5	图书馆建筑、设备、用品	62	2
6	图书补充:采访、征集、寄存、 呈缴	131	18
7	图书学:总论、印刷、出版、装订 和修补	209	90
8	图书分类:总论、各种分类法、各 类文献	220	12
9	图书编目:总论、目录、各图书馆 及图书	153	3
10	目录学:总论、版本学、校勘学	97	18
11	索引法与检字法	178	4
12	图书典藏与图书借阅	276	25
13	图书馆史	1238	144

日本侵华战争的前6年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虽然也已显见,毕竟是局部战争,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小。而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就呈现出毁灭性的特征。从表4来看,全面抗战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全面抗战前发表的论文数量的比例,达40%以上的1项;20%以上的2项;10%(含)以上的4项;10%以下的则有6项,且其中3项均仅2%。可见落差幅度之大。而第4、5、9、11项(占总共13项的31%)在抗战8年时间里,论文发表数仅2—4篇,可见该类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3 图书馆协会的由盛而衰

作为行业学术团体之一,全国及地方各级图书馆协会存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比较抗战前后的图书馆协会的数量、人员、开展的学术活动,可以清晰地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残酷地斩断了图书馆协会的蓬勃生机,相应地使正处于上升通道的图书馆学术研究陷于停滞。

3.1 全国和地方图书馆协会集中成立于全面抗

战前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协会发端于地方图书馆协会,即1918年12月21日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图书馆协会。地方图书馆协会的相继诞生最终促成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即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25年6月问世。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一个工作重心便是进一步促进地方图书馆协会的发展。因此,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后,又有一批地方图书馆协会陆续成立。由此可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图书馆协会的黄金期。

图书馆协会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图书馆的极速发展而顺势出现的。维新运动后中国传统藏书楼逐渐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辛亥革命后,图书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18年,第一份全国图书馆数量调查表出炉,那就是沈祖荣的《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按照这份调查表的说法,此时,全国的图书馆数量是33间^[11]。而到了1935年,在许晚成的《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图书馆数量已高达2520间^[12]。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想急剧涌入,又由于一批留学欧美专修图书馆专业的专门人才回国而带回先进的现代图书馆理念,加之新图书馆运动如火如荼,图书馆从业者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模式落后的状况凸显,尤其是图书馆界“无组织,缺乏联络,各行其事”^[13]。而“想谋图书馆教育的发达,同业里边要有共同的组织”^[14],这个“共同的组织”,便是图书馆协会。

事实上,图书馆协会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有之,以始于1876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为完善。就亚洲而言,1892年,日本图书馆协会成立。这显然对海外留学学习图书馆学的学生产生深刻影响。曾经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的戴志骞便是其一,而中国近代第一家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便是由他参与发起而组织成立。尽管该协会未经教育部批准立案,但从章程制定、会员构成、会长选举、活动范围等方面看,它基本具备了图书馆协会的一般属性。会长由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代理主任的袁同礼担任,经费来源是庚子赔款,主要学术活动是“兴办关于图书分类、图书馆组织目录以及欧美图书馆现状等方面的学术报告会”等^[15]。但一来未被批准立案,二来经费日渐困难,三来袁同礼于1920

^① 资料来源:根据李鍾履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一辑(清末至1949年9月)内容统计与制表。

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深造,北京图书馆协会逐渐停止了活动,实则无疾而终。

如果以“批准立案”为标准,1924年3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敦请下,由戴志骞再次发起成立的北京图书馆协会成为“第一家”图书馆协会。也就是说,图书馆协会由此进入快速增长轨道。据统计,抗战前,以1925年6月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为界,之前,即1924年3月—1925年6月,全国地方图书馆协会共有10家(见表5)。

表5 1924.3.—1925.6.地方图书馆协会概况^①

协会名称	成立时间	成立地点	主要发起人	会员组成
北京图书馆协会(北平图书馆协会)	1924.3.30.	清华学校图书馆	戴志骞	图书馆、个人
杭州图书馆协会	1924.4.26.	省公立图书馆	章仲铭	
开封图书馆协会	1924.5.	省第一图书馆	何日章	图书馆、个人
南阳图书馆协会	1924.5.			
上海图书馆协会	1924.6.27.	总商会图书馆	杜定友 孙心磐 黄警顽	团体、个人
南京图书馆协会	1924.6.	东南大学图书馆	洪有丰	团体、个人
天津图书馆协会	1924.6.	南开大学图书馆	王文山	图书馆、个人、特种(捐款人)
江苏图书馆协会	1924.8.3	东南大学图书馆	洪有丰	团体、个人
广州图书馆协会	1925.4.2	广州大学图书馆	吴康发	团体、个人
济南图书馆协会(山东图书馆协会)	1925.6.	齐鲁大学图书馆	桂质柏 彭清鹏	团体、个人、名誉会员

1925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受其影响,又有一批地方图书馆协会成立,分别是武汉图书馆协会(1928年)、太原图书馆协会(1929年5月20日)、福建图书馆协会(1929年9月7日)、浙江省立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1930年5月在原杭州图书馆协会基础上改组)、无锡图书馆协会(1930年)、瑞安图书馆协会(1930年9月14日)、安徽图书馆协会

(1931年6月22日)、浙江省立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1932年5月22日)、江西图书馆协会(1932年1月14日)、四川图书馆协会(1934年3月13日)、浙江图书馆协会(1936年4月19日在原第一、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基础上改组)。

也就是说,截止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性和地方性图书馆协会总计20余家,而且彼此交流活跃、学术活动频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在1937—1945年抗战8年期间,仅有1家图书馆协会面世,那就是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它于1945年4月8日由国立西北图书馆、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甘肃科学教育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5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16]。这样数量上的极大悬殊足以证明侵华战争对图书馆协会以及由图书馆协会组织举办的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3.2 中华图书馆协会六次年会在全面抗战前后的比较

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图书馆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的意义非同一般。其在“成立宣言”中说,“馆政之良窳,与专学之兴废,遂大有关乎民族之盛衰”,而“馆政”与“专学”便主要体现在图书馆事业的改进、图书馆学术的研究等方面。这也是协会所要遵循的宗旨。为此,协会组织大纲规定:“每年开年会一次,其地点及会期由前一年年会决定之。”^[17]也就是说,年会是协会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一,但实则协会并没有做到“每年”召开一次。在1925—1949年长达24年的存续时间里,协会只开过6次年会。以1937年为界,之前3次,之后3次。尽管从次数上看,抗战前后并无区别,但从组织、会期、参加人员、会议议题、通过提案等各方面看,也就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是能够真切感受到前3次会议愉悦的兴旺、后3次会议凄婉的颓势。可见,战争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破坏程度。

前3次、后3次年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图书馆行业最高学术团体的身份独立组织、操办,即,这是图书馆行业自己举办的图书馆学术会议。后3次则不然。其时已经进入全面抗战,中华图书馆协会被迫辗转迁徙,最后落脚重庆。

^① 资料来源:(1)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2)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华民国年鉴.1981;(3)金敏甫.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4)胡卫玲.民国地方图书馆协会成立考述。

为应对战时学术团体四散飘零、各学科学人颠沛流离的窘境,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应运而生。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38年9月加入其中,成为其下属机构,共谋战时事业发展。因此,抗战中的3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其实是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中的一个分支。换言之,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中华图书馆协会已无力将图书馆学人尤其是杜定友、刘

国钧等图书馆界精英召集起来单独举办一次学术年会了——当时,杜定友身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随学校“辗转于粤桂滇黔湘”,而刘国钧“先随金陵大学在成都,后又受聘赴西安筹建西北图书馆”^[18]。不仅如此,这3次年会的规模、议案、论文等都与战前的3次年会不可同日而语(见表6)。

表6 中华图书馆协会前3次、后3次年会概况比较^①

会务	前3次(1929—1936年)	后3次(1938—1944年)
时间	1929.1.28—2.1;5天;200余人	1938.11.27—30;4天;63—82人
会期	1933.8.28—31;4天;200余人	1942.2.8—9;2天;34人
人数	1936.7.20—24;5天;150余人	1944.5.5—6;2天;60—65人
会议地点	1、南京金陵大学 2、北平清华大学 3、青岛山东大学	4、重庆新市区川东联立师范学校 5、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6、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中心议题	1、训政时期中之图书馆工作 2、图书馆经费及图书馆与民众教育 3、关于改进图书馆行政要点七项	4、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实施问题 5、缺 6、战后图书馆复员计划和所需人员培养
提案 通过议案 论文	1、110件;88件;24篇 2、30件;6篇 3、约58件	4、13件;8件;4篇 5、缺 6、10件;8件;
组织和活动	1、①每日举行学术演讲及宣读论文;②举行分组会议、各委员会会议;年会会议分为讲演会、会务会、分组讨论会三种。其中分组讨论会又分图书馆行政、分类编目、编纂、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建设、索引检字六组。 2、分组会议分民众教育组、图书馆经费组、图书馆行政组、图书馆教育组;分类编目组、索引检字组六组。 3、举行演讲、宣读论文 设图书馆行政组、图书馆教育组、分类编目组、索引检字组、民众教育组五组。	4、以协会名义发表《抗战建国时期中之图书馆》。 5、①8日下午,会员座谈会。讨论出席会员募捐办法以及在渝设立办事处等。 ②9日晚上,会员联谊会。 6、袁同礼作会务报告,谈会员、经费、调查工作等。

从表6可以看出,原本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19]为己任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抗战爆发后不得不将工作重心由单纯的图书馆学术研究转向战争状态下的图书馆具体工作,即:战时图书馆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应对和解决。这种“转变”,也是幸存的、尚勉强维持的地方图书馆协会所不得不面临的新课题。

3.3 图书馆协会从“论学术”到“求生存”

无论是中华图书馆协会,还是众多地方图书馆协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都被迫或离乡背井或销声匿迹。战争破坏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土壤,大多数地方图书馆协会相继停止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以北京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硕果仅存的几家地方图书馆协会虽然在战时仍然于大后

方维持协会的日常工作,逆境中继续保持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初心,但受限于恶劣时局和苍凉环境而无法专注于图书馆学术研究,无奈转向努力为图书馆求生存。

战前,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学术活动除了不定期召开年会以外,还体现在图书馆技术改进、图书馆人才培养、图书馆学术刊物编纂和出版、图书馆新思想宣传等方面。首先,图书馆技术改进方面。以“分类法”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鼓励会员编制新分类法,专门在其主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开辟专栏,刊登分类法研究成果;1929年的第一次年会特别有编制分类法的提案^[20]。随后,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1934年)、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1935

① 资料来源:(1)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2)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华民国年鉴,1981;(3)梁桂英,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述略。

年)等相继问世。以“编目”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便有编制联合目录之打算,因经费不足而未能践行,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登载编目编订条例、有关编目方面的论文甚多,成果颇丰。例如,刘国钧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1929年)、沈祖荣译《简明图书编目法》(1929年)、裘开明的《中国图书编目法》(1931年)等。以“索引”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一直设有索引委员会,将“编辑索引条例”作为明确的工作计划,因此催生了钱亚新的《索引和索引法》(1930年)、洪业的《引得说》(1932年)等。

其次,在图书馆人才培养方面,中华图书馆协会里的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机构,主持图书馆学校的建设、开办短期图书馆讲习会等。有感于图书馆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任免尚无统一的规定,协会第一次年会特别提交了这方面的提案,建议“图书馆雇佣职员应须有图书馆学识及丰富经验”“职员之位置,须有确实保障并须予与优良待遇”^[21]等。次年,《图书馆规程》规定了图书馆馆长的资格认定。1939年,《修正图书馆规程》对于各级图书馆人员的资格作了详细规定。

再次,在图书馆学术刊物的编纂和出版方面,中华全国图书馆协会设有出版委员会,负责编纂和出版图书馆学期刊、丛书、报告等。其中两本著名期刊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前者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期刊之一,对于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小图书馆,它起到了传达、沟通、协调、扶助的作用;后者着重于图书馆学论文的发表。其出版的丛书和报告包括王重民编《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文学论文索引》《古逸书录丛辑》《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等^[22]。上海图书馆协会发行的期刊有《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明确的目的是“谋我国学术之进步”^[23];出版的图书馆学专著有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等8种^[24]。

第四,在图书馆新思想宣传方面,展览、演讲是上海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用来宣传图书馆新思想、传播图书馆新知识、展示图书馆新成果的主要方式。1926年1月,上海图书馆协会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图书馆展览会,陈列了图书馆学书籍、设备、用具、照片、图表、善本。“展览两日,参观者异常踊跃,对于图书馆知识之灌输,收效甚巨焉。”^[25]就“演讲”而言,杜定友、江亢虎、方椒伯、郑海宗等先后

被上海图书馆协会邀请就图书馆意义、图书馆对公众开放、读书方法等发表演讲^[26]。北京图书馆协会重要的图书馆学术演讲包括冯陈祖怡的《中文目录片排列法问题》、谭新嘉的《目录学与版本学之同异》等^[27]。显然,这一切都有助于新图书馆理念的传播且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地方图书馆协会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戛然而止,唯有迁至重庆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仍艰难支撑。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40—1945年编制了一套分类法,但未能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更多地刊登图书馆法规、规程、工作大纲、阅览办法等一般社会规范性文件。仅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第六次年会中心议题便可以看出,战时,协会的图书馆工作大多与“抗战”有关,即抗战状态下的图书馆生存之出路。

第一,调查图书馆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陷于深重灾难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宝藏集聚地的图书馆未能幸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建筑、设备、馆藏在次轮轰炸中损失惨重。1937年10月起,中华图书馆协会便着手进行图书馆损失调查。1938年4月,协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4个通讯联络处,“征求图书馆被毁事实及此项照片”^[28]。最终,协会将调查结果结集成册,翻译成英文后出版《中国图书馆被毁经过》,分别寄送世界各国。上海图书馆协会也参与此项调查工作,并编辑出版了《战时读物目录》^[29]。这两份出版物一来将日本侵略军暴行公之于众,二来为战后索赔积累证据。

第二、征集图书,组“战时读物文库”。轰炸、迁徙,不可避免地,每个图书馆的图书都被毁严重。为生存继而复兴,中华图书馆协会广泛征集图书,尤其向美英等国请求援助。美国反应积极,特成立赞助委员会,发函“请国人捐书运华”公开征书^[30];英国方面,由英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征书启事”,请求各图书馆学术团体及会员们协助^[31]。为此,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接受国外捐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外捐书经由香港运抵大后方,最先满足各大学教学所用。上海图书馆协会在1937年10月份时组织“战时服务团”。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该团征集图书举办“战时读物文库”“伤员医院难民收容所巡回文库”“战时书报阅览处”^[32]。

第三,在西南地区新建图书馆。战火纷飞,内地

图书馆惨遭毁灭性打击,文化事业单位退避西南大后方。原先,这里偏远落后,图书馆事业远不及东部发达,本就需要图书馆基础建设;如今,这里已然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缺失、图书馆管理理念相对保守的弊端显露无遗。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积极联系和努力运作下,1940年4月,中英庚款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联合组建了昆明图书馆。而对于西南原有的图书馆,协会“派人予各省指导,助其发展,寄赠图书,藉以改善其组织,充实其内容,而增强抗战之情绪”^[33]。

总之,从图书馆学术研究方面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各地方图书馆协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都处于停滞状态。尽管有些协会战时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而仍然发挥着“协会”协调、沟通、指导、扶助的职能,但其“活动”大多只限于与抗战有关的事务性工作。对于所有的图书馆协会而言,像战前那样致力于图书馆学研究已成为不可能。

4 结语

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既是一场针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战争,作为精神遗产与文明传统渊藪的图书馆及其学术事业活动未能幸免于战祸兵燹就不足为怪,也愈见日本侵华战争的广泛性与残酷性,愈见日本军国主义者亟欲摧毁华夏根基、阻断民族文脉的狼子野心。正处事业蓬勃发展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术遭此重创,其本身的损失难以估量。而中国图书馆学术事业发展进程的大为延缓,也必然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1 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205.
- 2 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43.
- 3 同[1]:193.
- 4 徐引篔,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1
- 5 程焕文.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期刊史略(上)[J].图书馆,1985(5):32.
- 6 辜军等.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种期刊分类索引.前言[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7 叶继元,徐雁.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回眸南京大学在欧美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G]//南京大学百

- 年学术精品:图书馆学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
- 8 国家图书馆.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1—5)[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015.
- 9 薛建立.我国最早自我宣介的杂志——《出版周刊》[J].传媒,2001(8):40.
- 10 谈金铠.略论解放前我国图书馆专业期刊的发展[J].图书馆论坛,1991(8):99—100.
- 11 沈祖荣.沈祖荣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0.
- 12 柯平,张怀涛等.图书情报学文献检索[M].河南省图书馆学会,河南省图书馆,1988:49.
- 13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北京:中国图书馆学会,1983:211.
- 14 杨昭慈.图书馆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233.
- 15 孙广来.世界百年风云纪实(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6.
- 16 文化动态: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J].西北文化,1945(21):1.
- 17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宣言[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3.
- 18 同[1]:254.
- 19 同[13]:213.
- 20 协会分类委员会启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0,6(2):34.
- 21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R].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178—190.
- 22 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G].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328.
- 23 杜定友.发刊旨趣[J].图书馆,1926(6):12.
- 24 黄蕾.民国时期的上海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学近代化[J].图书馆界,2017(5):34.
- 25 上海图书馆协会史略[J].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报,1937,2(9):138.
- 26 上海图书馆协会昨日开年会记[N].申报,1925.1.5.⑩.
- 27 袁碧荣.民国北京图书馆协会之探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增刊2):21.
- 28 本会设立通讯处[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1):20.
- 29 秦亚欧,孙旸.地方图书馆协会对民国图书馆事业的促进及影响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1(11):15.
- 30 美国援助中国之一般[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3):17—18.
- 31 英国图书馆协会发起捐书援华运动[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14(2—3):11—12.
- 32 市图书馆协会组战时服务团[N].申报,1937.10.25.
- 33 同[22]:325.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南京,210097

收稿日期:2018年3月6日

(转第100页)